

—◇ 郑大史学书系 ◇—

MINGUO SHIQI
DIANYUAN
QUNTI YANJIU

民国时期
店员群体研究

巴杰◎著

人
民
大
版
社

—◇ 郑大史学书系 ◇—

MINGUO SHIQI
DIANYUAN
QUNTI YANJIU

民国时期

店员群体研究

巴 杰 ◎ 著

人 文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徐林香

封面设计: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店员群体研究/巴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 - 7 - 01 - 016150 - 1

I . ①民… II . ①巴… III . ①店员-研究-中国-人民 IV . ①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961 号

民国时期店员群体研究

MINGUO SHIQI DIANYUAN QUNTI YANJIU

巴 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77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6150 - 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I
第一章 民国时期店员群体概况	26
第一节 清末民初商业的发展及店员群体的壮大	26
第二节 店员的数量	32
第三节 店员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	44
第四节 店员的籍贯分布	50
第五节 店员的性别比例	54
第二章 店员的生存实态	59
第一节 店员的工作情况	59
第二节 店员的收入情况	70
第三节 店员的生存抗争	94
第三章 店员的职场文化与业余生活	104
第一节 店员的职场文化	104
第二节 店员的业余生活	141
第四章 店员的言论诉求	149
第一节 店员的言论诉求——《申报·店员通讯》《伙友》 《永安月刊》	149

第二节 阶级动员与纪律塑造	156
第三节 力图改造与店员的自我认同	164
第五章 国民革命时期激烈的店员运动.....	170
第一节 店员的政治参与	170
第二节 店员与劳资争议	186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店员运动（1928—1945）.....	198
第一节 店员与新生活运动	198
第二节 战时体制下的店员运动	204
第七章 抗战胜利后店员运动的抗争与背离.....	223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店员运动	223
第二节 职业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238
结 语.....	257
附 件.....	264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76

绪 论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对历史上众多社会群体的研究，不仅能够重新透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特点，而且还能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①最早将近代中国社会群体及其关系纳入考察视野并进行专门研究的大多为国外学者，诸如何炳棣、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小岛淑男、白吉尔、费正清、芮玛丽等对商绅阶层的考察^②。但海外学者的研究视野局限于分散的“点”，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内在联系、差异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章开沅等学者才倡导群体史研究，强调要对资产阶级群体做认真、深入、细致的调查，通过群体、团体及阶层的结合来补充单纯阶级分析方法的不足，还历史以血肉^③。起初的研究视野集中在上层社会群体方面，诸如马敏、朱英、李达嘉等人对商人

① 朱英：《从社会群体透视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7 期。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日]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的士绅：商人阶级与上海独立运动》，《东洋史编》1960 年第 6 期；[法]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 年第 5 期。

群体的研究，李喜所、王奇生等人对留学生群体、县长群体的研究^①。至于“社会底层很少涉及”^②，这里所说的底层是个笼统概念，不是精确的划分，当然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韦伯学派的社会分层标准。概而言之，底层包括小手工业者、店员、小摊贩、产业工人、佣工、码头搬运夫、人力车夫等。

此后，随着“眼光下移”的研究趋势，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基层社会群体，人力车夫、女佣、码头工人、秘密会党、流民、乞丐、娼妓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③，处于中间阶层的自由职业群体也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④，唯独对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的基层职业群体——店员知之甚少。

店员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国民革命时期，店员的组织程度仅次于产业工人），其活动对城市文化、都市性格都有着显著影响。考察梳理店员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工作环境、薪金待遇、职场文化、社会形象、娱乐活

①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巴蜀书社1993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1905—19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册，1993年6月；李达嘉：《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冯筱才：《浙江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认识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7年。

④ 孙惠敏：《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1911—1912）》，台湾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2年；魏文享：《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张丽艳：《通向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3年；尹倩：《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8年；朱英：《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动，解析店员工会的组织网络、治理结构、政治参与及其公益职能，可以深化我们对基层群体的认识，扩大底层声音，进而推动城市史、劳工史及商民运动的研究。解读国、共两党之于店员的身份认定及其与店员工会的关系，可以透视出“社会与国家”理论框架在基层社会群体研究中的适用范式。国民党对店员的认识，经历了商人——工人——商人的转变，店员组织有着从商民协会到工会、独立店员工会再到商民协会的曲折发展历程。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针对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中国共产党则自始至终把店员界定为劳动阶级，“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之一”^①，“地位仅次于产业工人”^②。国民革命运期间，共产党大力支持店员成立工会组织，并取得生活改善的部分成果。至于国、共两党主导下的店员组织，不同旨趣背后有着处于政府监管之下的共同特征：国民政府指导下的店员工会，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合作者；共产党主导的店员工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的延伸，而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方势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 基层社会群体研究

研究基层社会群体，首先要统计其数量规模，了解其行为规范，分析其内部构成，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活动规律，定位其社会角色。基层社会群体由于在文化知识掌握上的不足及社会话语权上的弱势，使得这一基础性的研究变得困难重重。尽管如此，不少学者仍对其所研究的社会群体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史实建构。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对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破产劳动者、游民是秘密会党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揭示近 200 年来会党演变的历程及

① 陈独秀：《〈伙友〉发刊词》，《伙友》第 1 册，1920 年 10 月 10 日。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 年 7—12 月），1958 年，第 465 页。

其在中国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①。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一书对天地会起源问题做了有力的论证，尤其对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支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叙述^②。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一书揭示了近代帮会与国家政权、秘密宗教、民间武术、游民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次社会反抗运动和民族危难中的表现^③。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以原始档案为分析文本，详细梳理了中国民间宗教，特别是明清宗教的发展脉络，认为民间宗教的源头是儒释道三教^④。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及后来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考察了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历届政府处理流民的政策等问题^⑤。“流民流入城市，成为产业预备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来源；流民的涌入加速城市化进程；流民在城市中受城市文明影响，思想、行为等渐渐远离传统约束，当他们季节性回流农村，成为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的中介；流民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流民集中城市造成很大压力，城市病由此而起；流民大量涌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使其供给远远超过需求；由于近代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城市无法吸纳庞大的流民大军，造成人口职业的畸形；入城流民以男性为主，造成性别比例失调；流民大量流入城市还造成城市犯罪率增高、盗贼充斥、帮会肆行、流氓遍布等社会问题。”^⑥陆德阳、王乃宁《社会的又一面——中国近代女佣》一书考察了女佣的日常生活、出路，女佣与东家、社会名流、洋人等阶层的关系及文人笔下的女佣等，在此基础上归纳中国近代女佣的特点，分析其社会影响、历史地位^⑦。

^①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② 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④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⑤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⑥ 池子华：《论近代中国农民进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池子华：《流民：从传统到近代》，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8 页。

^⑦ 陆德阳、王乃宁：《社会的又一面——中国近代女佣》，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

民国时期，娼妓业畸形繁盛，妓女群体因而成了近代中国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中为数众多的一分子。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一书，对妓女的来源、等级、活动、社会关系及自我认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注重分时段、分区域考察，诸如各时期的嫖客构成、妓女表现等，但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妓女群体的规模问题没有具体统计^①。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一书从剖析高级妓女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状况着手，对近代上海的卖淫市场、性经济进行了深入翔实的考察。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所拒绝的社会^②。张百庆《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娼妓问题》一文则将娼妓问题纳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领域^③。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一书以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为解读文本，分类统计了上海各等级妓女的情况，进而探讨娼妓与政治权利、商业经济、社会改革、民族意识、社会性别构造等方面的关系^④。

城市基层群体成员大多出身农村或城市的贫困阶层，先天缺乏接受较好文化及技能教育的机会，成年后大多只能从事劳动条件差、收入低、缺乏稳定性的工作，或者无正规工作，甚至是“捞偏门”维生，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工作性质、分布居住、生存状态、社会地位，乃至社会心态等方面的边缘性以及这种边缘性的世代继承性。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对上海苏北移民群体的出现及从业经历、劳工市场族群现象的兴起及苏北移民群体的特性进行了详细解析。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垃圾清运工等苦力劳动是苏北人在上海从事的主要工种^⑤。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一文认为地缘关系是工人职业分层的直接决定因

①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法]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张百庆：《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娼妓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④ [美]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韩敏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 [美] 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素。苏北人在江南都市中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原因即在于缺乏足够的、可资利用的各种乡谊资源。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分层消融了阶级分立对下层群体的影响，“帝国主义”、资本家阶级的剥削，远不如上层群体的歧视和偏见感受深刻^①。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一书考察了农民工群体，试图通过近代农民工的流动现象揭示社会演变轨迹^②。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劳资纠纷及其影响》一文以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码头工人为考察对象，认为码头劳资纠纷的根源在于工作权的封建把持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由雇佣原则之间的矛盾^③。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贫民阶层的边缘阶层》一文认为灾民是城市贫民阶层的主要来源，“边缘化”是城市贫民阶层的生存特征，这种边缘化既是空间分布的表现，又是生存方式的表现^④。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一书分析了城市中下层市民中特殊群体的分层结构、收入情况和生活状况，认为城市贫民属于自谋职业者，多从事理发、淘粪、拉洋车等社会生活服务事项，其职业是在城市社会发展中自发形成的^⑤。

人力车夫作为下层职业群体在城市交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是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戴维·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20世纪20年代城市居民与政治》一书遵循“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模式，描述了北京早期公共领域的发展，“晚清时期中国新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催生了一个由新旧公共团体合成的‘新的政治舞台或公共领域’”^⑥，这一领域成了保护人力车夫、挑夫等新市民劳动权益的重要渠道。马陵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一文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入手，解析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职业群体的边缘性，并通过政

① 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② 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7年。

④ 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贫民阶层的边缘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⑤ 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⑥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府机构管理模式“改良”、人力车夫“自助”制度的剖析，揭示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畸形与痛疾^①。部分学者则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人力车夫问题，“车夫身上凝聚着民国社会的多种信息，既反映了劳苦大众贫困生活，又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衬托出了交通近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前进与保守均难取舍的两难境地”^②。邱国盛《北京人力车夫研究》一文通过人力车夫来源、构成、工作内容及生活程度的分析，揭示早期北京城市结构、功能现代化转变的迟缓^③。孔祥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一文探讨了民国社会各种交通工具的矛盾冲突，认为矛盾根源于政府取缔与安置人力车夫的政策错位^④。迫于生活压力，人力车夫往往对城市电车、公共汽车持敌视态度，政府当局的废除人力车政策时常会引起人力车夫的罢工抗争。构建交通近代化的同时，政府没能解决好人力车夫的再就业，使其被动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和受害者”^⑤。也有学者以人力车夫的群体意识为考察对象，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一文认为彼此之间的微弱联系及与外界的纵向比较形成了人力车夫的同行、同乡及穷人意识，精英分子的启蒙及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则使其群体意识升华为阶级意识、民族意识^⑥。刘秋阳《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认识与启蒙》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人力车夫成为现实革命力量的努力，有着从认识到启蒙的过程^⑦。

基层群体的研究还受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刘平《文化与叛乱》一书以大众文化的视角解读秘密社会，认为中国的民间文化、信仰构成了秘密社

① 马陵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② 王印焕：《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邱国盛：《北京人力车夫研究》，《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④ 孔祥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

⑤ 王印焕：《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⑥ 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⑦ 刘秋阳：《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认识与启蒙》，《党史文苑》2006年第20期。

会的存在土壤，并从表现方式、思想信仰等方面解析清代秘密教门、会党的文化内涵，探讨这些文化内涵与秘密社会反叛行为的联系，对秘密社会的行为方式、文化特征、社会基础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①。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一书梳理了各地匪情及各派政治力量与绿林的复杂关系，以绿林力量的兴衰成败来透视民国时期的政体变化、政局变动、社会变迁等^②。冉光海《中国土匪》一书论证了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土匪活动形式、规律的影响^③。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一书对上海黑社会的内部结构、帮规会律、入帮仪式、升迁机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揭示黑社会在上海出现、发展及消亡过程^④。

乞丐是近代中国颇为庞大的一个次生群体，“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国为独多”^⑤。周德钧《乞丐的历史》一书着重分析了乞丐的类型、乞讨方式、流氓行径、江湖庸劣习气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由，认为消除乞丐文化如同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属文化改造、创新工作^⑥。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考察了近代上海的乞丐“阶层”，透过乞丐群体的差异解读、政府之于乞丐的政策导向，展示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⑦。部分学者着眼于乞丐的破坏性，曲彦斌《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研究之十——乞丐群体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乞讨现象与中国民族文化对乞讨行为的包容有关。职业乞丐群体除有伤风化、破坏社会秩序、滋生社会犯罪外，其不计利害、手段，只图短时期个人利益而不顾后果的流氓行径对社会道德、生活秩序的侵扰尤甚^⑧。池子华认为职业乞丐不劳而获寄生于社

① 刘平：《文化与叛乱》，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冉光海：《中国土匪》，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④ 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72页。

⑥ 周德钧：《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⑦ [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曲彦斌：《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研究之十——乞丐群体的历史考察》，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会，本身即是“越轨生存方式”，这种“越轨生存方式”严重毒化社会风气、腐蚀民族道德。“三年讨饭，不愿做官”的口头禅，折射出乞丐的物质贫困、精神堕落，成了与文明相悖的亚文化群落^①。对乞丐的社会救济，李红英《略论近代中国社会职业乞丐问题》一文认为与收容、救济、遣返原籍等传统措施相比，创设工艺局属比较积极的防范和控制手段，肯定了民国时期政府机构及社会人士救济乞丐的努力^②。邓小东、杨骏《民国时期的乞丐及乞丐救济》一文认为乞丐的抵触心态影响了民国时期乞丐救济举措的效果^③。

但不可否认，目前城市基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与上层社会群体研究相比，研究者少，研究成果也不多，尚有大量的空白领域有待考察。二是现有研究极不均衡，特殊群体的研究较多，职业性群体研究较少。乞丐、娼妓等特殊群体，因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研究兴趣持续升温。而职业群体中的学徒、女佣等只有个别学者的少量成果，其他如厨役、店员、小贩、佣工等基本无人问津。三是现有的研究成果概括性论述较多，分区域及微观个案考察较少。大量翔实的个案研究是梳理基层群体之间、基层群体与政府间复杂互动关系的重要支撑。四是基层群体内部的分层及基层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关注不够。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内部都有着不同层次，不同层次其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同一群体内部有积极投身革命的，有疯狂破坏革命的，有的则属于其自身的无赖习气及封建意识无形中成了革命事业的阻碍因素。基层社会群体之间同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互动关系亦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五是资料的发掘运用不够。资料的有无及多少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城市下层群体的研究进展，“史学就是史料学”虽多招非议，但毕竟一语道出史学的真谛^④。

① 池子华：《沉重的历史省思——近代中国的乞丐及其职业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4期。

② 李红英：《略论近代中国社会职业乞丐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 邓小东、杨骏：《民国时期的乞丐及乞丐救济》，《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④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 近代中国工人研究

工人阶级的研究，早先遵循两条线索：以马克思为先导的历史唯物主义；以韦伯为鼻祖的文化主义。其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开创了“新劳工史”的研究时代。近 20 年的劳工研究，出现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特点，强调主体性与话语的作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①。中国工人群体的研究，肇始于近代中国激烈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深入。

民国时期工人群体的关注，起源于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马超俊《中国劳工问题》一书梳理了中国劳动者的种类、工作时间、报酬及失业、女工和童工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组织工人团体、发展工人教育、实行个人保险和个人储蓄^②。马超俊的另一著作《中国劳工运动史》着眼于中国劳工运动发展原因及中国劳工组织发展阶段，重点剖析劳工运动的经济、思想因素、工人的工资和生活、劳工组织发展及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工会的分裂、整顿、改组与取缔等问题^③，但马著的政治立场过于浓厚，观点多有偏颇之处。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一书介绍了 1924—1940 年间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与执行情况，该书的论述前提虽然是“为党国服务”，但提供了研究国民党劳工政策不可或缺的资料^④。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问题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对中共早期的工运策略有着详细的描绘^⑤。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著的《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介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机构、沿革，国际劳工立法及国际劳工公约、建议书的制订与实施，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的关系等^⑥。陈振鹭《劳工教育》一书对中国劳工教育的发展、劳工学校成立、劳工识字训练、劳工职业补习、劳工教育的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

^① 佟新：《新劳工史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主义到解构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

^② 马超俊：《中国劳工问题》，上海民智书局 1925 年版。

^③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2 年版。

^④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1 年版。

^⑤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⑥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主编：《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编者自印，1948 年。

述^①。但这些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着眼点在于关照社会现实、解决现实问题。

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何德明的《中国劳工问题》是学界对工人问题的最早关注。陈著在论述工人生活状况、劳工团体、罢工、劳工法规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劳工问题的措施：经济、工资、工时、待遇等方面应与工人生活情形相适应，以保证工人生存；社会需提供给工人相当的教育和法律保障。该书注重数据统计的科学化整理、分析，理论上将劳工研究划分三个维度：生活费、工资、工作时间；资本和劳工互动关系；社会福利设施等^②。何著论述了1912—1935年间产业工人的工资、工作时间、女工与童工、工会、罢工、失业、福利设施等问题的解决方法^③。《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在广泛访问工人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了上海22个产业部门的历史、职工、待遇、文化、行业重要活动等方面的相关史料^④。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一书展望了不同党派执政下的劳工生活前景，将劳工置于政治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中考察，认为过去的革命只是政治变动，忽视了社会改造，下层民众无法享受实际利益。在此背景下，工人心态和社会行动有了特殊的含义，“一方面受都市文化的洗礼，一方面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和一切恶势力的压迫，革命情绪较其他人民更为热烈”^⑤。卢正《劳动问题纲要》、刘星晨《劳工问题》、祝世康《劳工问题》等也介绍了工人的工资、工时、童工、女工、劳资矛盾，但内容具有同质性^⑥。

民国时期关于工人群体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成绩斐然，王清彬等编著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邢必信、吴铎等主编的《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撰委员会主编的《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和《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主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

① 陈振鹭：《劳工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③ 何德明：《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④ 胡林阁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

⑤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刊行。

⑥ 卢正：《劳动问题纲要》，上海法学社1929年版；刘星晨：《劳工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祝世康：《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要》等，是研究近代中国劳工群体的重要资料。以工人和工厂为对象的社会调查亦是民国时期学者的关注热点，包括工人家庭、生活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利用等^①。1946年，陈达等人对上海工人抗战生活状况进行大规模调查，涉及工厂集中的五个区，普查1682家工厂，148926名工人，并从中选择201份“工人生活个案”进行分析，以求了解抗战时期工人的心、理、生活，注重与重庆等地的对比研究^②。部分学者以工资收入和家庭消费结构为基础和标准来分析工人生活程度，诸如陶孟和《北平生活之分析》、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之研究》、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重庆社会部统计处《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和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关工人群体的研究论著150余部，1949—1984年出版近50部，1985—2000年出版100余部，2000年以后又有近10部；有关工人研究的论文500多篇，1949—1980年间330篇，1981—2004年间170余篇，其中1981—1991年间形成研究高潮，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0篇以上^③。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及其发展状况、劳动和生活状况，政党之于工人及工运的政策、法令、措施，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活动，各个时期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工人的文化生活，有关工人的宣传教育、报刊出版等都有着翔实具体的描述^④。王永玺等主编的《中国工会史》、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以工会的产生、组织、活动为中心，概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百余年的工运史^⑤。黄汉民《试论1927—1936年上海工人工资水平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刘志强、姚玉萍《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其革命动因的考察》、陆兴龙《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及家庭消费状况简析》、张

^① 这些调查大都收入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丁云亮：《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上海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6年，第10页。

^③ 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7年，第9页。

^④ 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⑤ 王永玺：《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